

戴一峰 等◎著

海外移民与
跨文化视野下的

近代鼓浪屿 社会变迁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1840

1950

1850

1945

1860

1940

1870

1935

1880

1930

1890

1925

1900

1920

1910

1915

1920

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 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

戴一峰 等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移民与跨文化视野下的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戴一峰等著.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615-6912-2

I. ①海… II. ①戴… III. ①社会变迁-研究-鼓浪屿-近代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4641 号

出 版 人 郑文礼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特约编辑 戴浴宇

封面设计 蒋卓群

技术编辑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xmupress.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30

插页 2

字数 50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版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编委会:

顾 问: 游文昌

主 任: 郑一琳

副主任: 张顺彬 王唯山

主 编: 戴一峰

编 委: 陈辉杰 徐晋民 陈 芳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为什么是鼓浪屿	1
第一节 缘起:问题意识与样本选择	1
第二节 检讨:研究回溯与资料检索	8
第三节 文本:叙事结构与主要内容	18
第二章 鼓浪屿近代社区的形成与人口变迁	24
第一节 鼓浪屿早期聚落的形成及其居民	24
第二节 外国侨民的移居与近代社区的萌生	35
第三节 闽南海外移民返乡与近代社区的发展	41
第四节 鼓浪屿人口的空间结构与自然结构	47
第五节 鼓浪屿人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	54
第六节 近代鼓浪屿人口变迁的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70
第三章 近代鼓浪屿的社会经济变迁	77
第一节 近代鼓浪屿社会经济概貌	77
第二节 近代新式商业的发展	82
第三节 新式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88
第四节 近代金融业的兴起	98
第五节 别具一格的侨批业	111
第六节 移民企业家群体及代表人物	129
第七节 对近代鼓浪屿社会经济的再认识	149

第四章 近代鼓浪屿的宗教信仰与社会风尚	152
第一节 早期鼓浪屿居民的宗教信仰及其延续	152
第二节 传教士与西方宗教信仰的传播	160
第三节 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	174
第四节 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	185
第五节 娱乐休闲方式的变化	203
第六节 近代鼓浪屿宗教信仰与社会风尚变迁的特征	221
第五章 近代鼓浪屿的文化教育与医疗卫生	230
第一节 鼓浪屿近代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230
第二节 闽南白话字的创立	284
第三节 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兴办与发展	293
第四节 鼓浪屿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	328
第六章 近代鼓浪屿社区的建设与管理	344
第一节 社区公共设施建设的演进	344
第二节 社区管理组织的演化	373
第三节 社区管理的制度变迁	385
第四节 近代鼓浪屿社区建设与管理的特点	412
第七章 结论:鼓浪屿历史的思考与启示	418
第一节 自然禀赋与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的路径选择	418
第二节 海外移民与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的主要推手	422
第三节 跨文化对话与近代鼓浪屿社会变迁的多元面相	426
参考文献	434
后 记	473

第一章

绪论:为什么是鼓浪屿

第一节 缘起:问题意识与样本选择

今天我们无疑正处于一个激烈变动的新时代。流动性与灵活性的加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并存,多元文化交流与碰撞的提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当人们试图从各自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时,我们注意到,学术界的一种流行观点竭力强调当今时代的断裂性,因而完全忽视了今天社会变迁的历史连续性。连续与断裂,在历史长河中并非绝然隔离为二。连续中有断裂,断裂中有连续,这应是历史发展的自然面目。鉴于此,本书选择了中国东南沿海厦门湾里的一座海岛鼓浪屿,力图在长时段的视野下,考察和讨论这座海岛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近百年间走过的近代化历程及其经历的社会变迁,探索一个既定区域的结构性要素以及历史积累与积淀,如何影响和制约该区域的近代化进程,锻造其鲜明样貌,形塑其基本特征,探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的时代,移民及其负载的文化要素如何与移居地本土的异质文化产生碰撞、冲突、交错和交融,从而影响着该特定地区的历史进程。

鼓浪屿是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南部(简称闽南)九龙江出海口厦门湾里的一座海岛,与厦门岛隔着 600 余米宽的鹭江海峡遥遥相望,行政上隶属于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全岛外观略显狭长,犹如一艘停泊在海湾的帆船,面积约 1.88 平方公里。岛上散布着 7 座花岗岩小山,以及众多的洞壑和井泉。环岛四周,白色的沙滩与多姿的礁石群交替散布,给这座海岛增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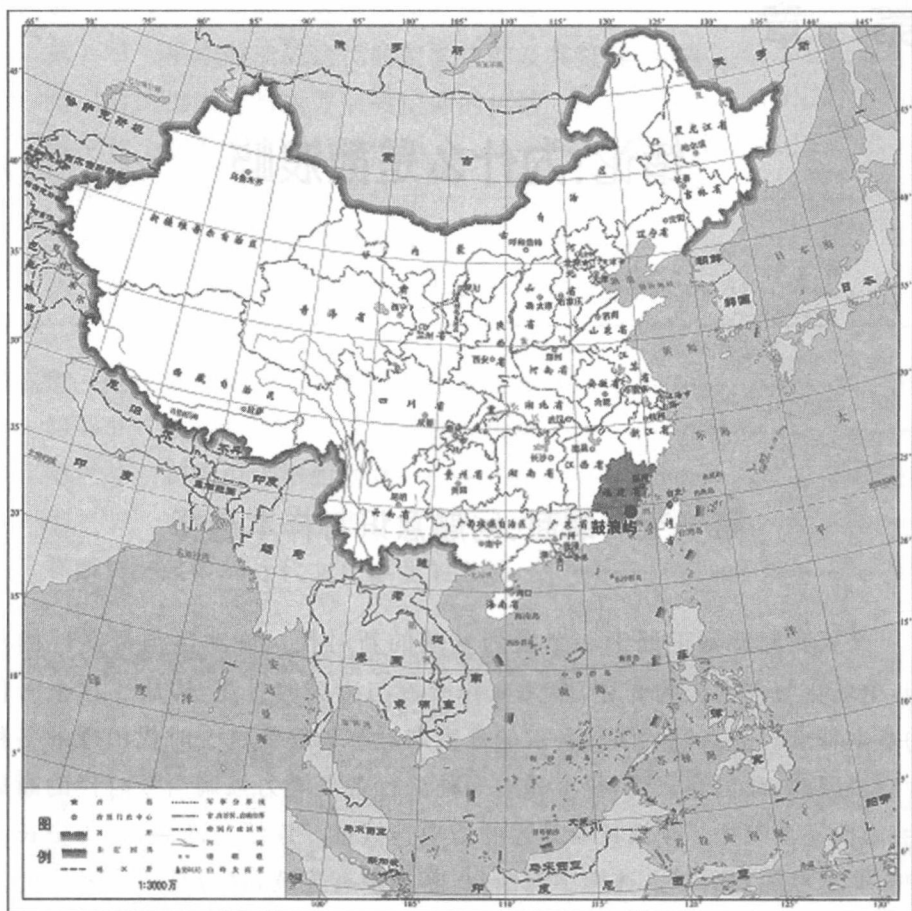


图 1-1 鼓浪屿区位图

了几多秀美。这里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温暖潮湿，雨水充沛。全岛生长着数千种植物，遍地是常年郁郁葱葱的绿树。这使鼓浪屿成为厦门湾万顷碧波上一座风光秀丽，气候宜人，适合人居的海岛。然而，选择鼓浪屿作为研究样本，并非出于对它秀丽风光的迷恋，而是因为鼓浪屿独特而又充满魅力的近代历程。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鼓浪屿是一座无人定居的海岛，尽管偶然有人造访它，并留下活动足迹。大约在元代(1271—1368)，鼓浪屿邻近的闽南地区居民，在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海洋经略活动中，选择了鼓浪屿作为新的栖息之地，掀开了鼓浪屿开发的序幕。此后，经历数百年的历史风雨，因应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带来的东西方交通大发展，汹涌澎湃的第一

波全球化浪潮将闽南地区卷入其中。闽南地区居民的海上经略活动规模急剧扩展,海外贸易与移民迅速增长,移居开垦鼓浪屿的闽南居民人数也不断增加。虽然中经明代初年居民奉命内迁和复旧的挫折,但随着闽南移民移居开发鼓浪屿活动的不断扩展、累积,鼓浪屿岛上渐次形成三个较完整的居民聚落——内厝澳、岩仔脚和鹿耳礁。随着鼓浪屿闽南移民聚落片区的渐次形成,显示聚落渐趋稳定和成熟的闽南传统文化标识——包括“大夫第”、“四落大厝”等现今依然留存的闽南代表性民居建筑,祭拜祖先的“黄氏大宗祠”即“莲桂堂”、“黄氏小宗”、“景贤堂”、“垂裕堂”、“四美堂”等祠堂和祭祀神灵的“种德宫”、“兴贤宫”等寺庙也相继出现。这表明鼓浪屿已经沉浸在闽南文化的汪洋中,深深打上闽南文化的烙印。

如果说中国东南沿海岛屿的早期开发,总是与周遭大陆地区居民的海洋经略活动密切相连,那么鼓浪屿的早期开发除了这一共同特点外,另有其特色。作为厦门岛海上屏障的卫星岛,鼓浪屿的早期开发、发展,是与厦门岛的发展紧密勾连的。这一特点一直带入近代。18世纪中叶,当厦门岛面对鼓浪屿的西南部成为一处繁华的城区时,鼓浪屿也成了一座“上有小山,田园、村舍,无所不备”,“鸡犬桃花云水外”的海岛。厦门地方文人雅士更是将充满田园风光的鼓浪屿视为别开洞天的乐土。^①而在行政区划上,鼓浪屿也一直隶属于厦门,是厦门市镇四社下的一个保,称鼓浪屿保。^②至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年间,鼓浪屿改为归属和凤前后社。^③步入近代前,据在鸦片战争期间进入鼓浪屿的外国人估计,鼓浪屿大约有3000名的居民。^④

19世纪40年代初,随着厦门的开埠,西方商人、传教士、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接踵而至。不断涌入的西方侨民自然寻求开拓合适的社会生活空间,以满足社会活动和居住的需求。在经历一番挫折之后,他们最后选定鼓浪屿为移居之地。鼓浪屿逐渐成为华洋共居相处的国际社区。外国侨民从租房到自建西式楼房,逐渐形成与华人居民聚落相对分离的居住区。各国

① (清)薛起凤主纂,江林宣、李熙泰整理:《鹭江志》卷之一,《山川》,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0页。

② (清)薛起凤主纂,江林宣、李熙泰整理:《鹭江志》卷之一,《四社》,《四都》,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7、48页。

③ (清)周凯:《厦门志》卷二,《分域略》,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9~30页。

④ [英]翟理斯:《鼓浪屿简史》,载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领事馆、教堂、教会学校、医院和邮局等也随之相继开办于此。^①至19世纪70年代,鼓浪屿的外国侨民已近200人。为了提升社会生活品质,1880年前后,居住在鼓浪屿的外国人组织了一个“鼓浪屿道路墓地基金委员会”,通过征收人头税、人力车辆税、马匹税、车辆税、坟地税等各种税款的办法筹款,在鼓浪屿居住区内修筑了道路,架设了街灯,整治了水沟,栽种了树木等,^②从而开始将他们的社会公共空间治理文化带入了鼓浪屿。

外国侨民中的传教士,则以鼓浪屿为中心,逐渐建立了一个覆盖整个闽南地区的传教网络。为了有效推进传教,教会和传教士把行医、办学作为传播福音的重要手段,将其视为传教事业的左右手。因此,教会、传教士在鼓浪屿掀开了兴办近代教育、医疗卫生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序幕,先后创办了20余所学校、数家医院,以及创办一些报刊。^③

与此同时,外国侨民还把西方业已成型的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带进鼓浪屿,影响了鼓浪屿的社会风尚。溺婴、缠足等一些代表传统文化糟粕的陈旧陋习受到冲击,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问题,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人身自由权等受到重视,华人居民的饮食习惯、服饰与发式等流行时尚、出行方式以及婚丧礼仪等社会生活习俗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来自异域的休闲娱乐方式也逐渐被本地居民所接受和喜好。西洋音乐和西式现代体育运动的逐渐流行,就是一个显著的标识。由于教会创办的学校中大多设置了音乐课和体育课,大大推动了西洋音乐和西式体育运动在鼓浪屿的传播与流行。^④

1903年,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无能,鼓浪屿被辟为公共租界,由外国侨民占主导地位的鼓浪屿工部局行使对鼓浪屿全岛的行政管理权。其主要职能包括“应添筑修理新旧码头、道路,设立路灯,须水通沟,设立巡捕,创立卫生章程,酌给公局延请办事上下各项员役之薪工及设法抽收款项”。于是,工部局引入西方的市政建设与管理理念及其制度设计,在鼓浪屿积极推行公共设施建设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管理体制。

由于作为工部局最高管理层的董事会从一开始就设置了一名华人董事,以及作为执掌司法机构的会审公堂由中国政府承担房租、薪金以及行政

① 张镇世、叶更新、杨纪波、洪卜仁:《“公共租界”鼓浪屿(1903—1941年)》,厦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第5页。

② *Decennial Reports, Amoy*, 1892—1901.

③ 详见本书第五章。

④ 详见本书第四章。

开支,其堂长及其下属均为由中国政府委任雇用的华人,因此鼓浪屿一开始就存在华人介入社区管理的缝隙和运作空间。此后,随着鼓浪屿华人人口发急速增长,尤其是随着一批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闽南籍海外移民从台湾和东南亚返乡^①,入住鼓浪屿,华人社会力量迅速增长,参与社区建设与管理力度不断加大。返乡的富有侨商不仅围绕着服务社区居民在鼓浪屿创办了戏院、市场等一系列新式商业,以及碾米厂、印刷厂、汽水厂、食品罐头厂、皮革厂、砖瓦厂等新式企业,而且在有力推进社区供水、供电、通讯、交通以及开辟公共活动空间等各种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方面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② 鼓浪屿国际社区聚落的格局,也逐渐从华洋并置,相对独立,转变为相互交错,相互融合。从而奠定了鼓浪屿社区聚落的基本样态和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返乡海外移民这个社会群体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随着他们成为鼓浪屿社区的纳税大户,他们对鼓浪屿管理事务的介入和参与也日渐增强。事实上,早在公共租界刚刚设立的1903年2月,闽南返乡移民就倡议组织设立“鼓浪屿会议公所”,于乌埭角每星期六晚聚会一次,讨论有关事项。首届议长由菲律宾归侨陈日翔担任。虽然被工部局借口该公所未经呈报,擅自成立,加以取缔,但以这个社会群体为中坚的华人参与鼓浪屿社区管理的强烈意愿已经初显。

1924年,这个鼓浪屿社会的精英群体仿照“洋人纳税者会”规章,组织“华人纳税者会”,用于委派工部局董事。尔后,鼓浪屿地方名流黄廷元发起组织“华民公会”,原华人纳税者会成员中的返乡移民精英如黄奕住、林尔嘉、黄仲训等都参加。华民公会因此取代华人纳税者会。1926年3月1日,华民公会召开董事会,提出修改《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改组工部局董事会,收回会审公堂等主张。驻厦领事团被迫接受修改意见,工部局华董名额由原来1名增至3名。1928年1月,华民公会会址迁到中山图书馆内,吸收新会员,扩大组织,成立“华人议事会筹备处”,发出改组通知书,分设7个登记处,进行选民登记,公开投票选举议员。当日参加投票选举的选民有2000

^① 本书中使用海外移民这一概念,意指移民台湾和东南亚的原中国居民。移民台湾属国内移民,移民东南亚属国际移民。其中,移居台湾的海外移民,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台胞”;移居东南亚的海外移民,以往学界则习惯以“华侨”称呼;对返乡的来自东南亚的海外移民,则习惯以“归侨”称呼。因此,本书有时因上下文的关系,也沿用这些称呼。

^② 详见本书第三章。

余人。经选举产生 20 名议员和 20 名候补议员,正式成立“华人议事会”。该会规定由议员中推举 3 人为主席团,主持日常事务,秘书 1 人。并规定议员每年由鼓浪屿全岛华人直接选举,连选可连任。议员如被选为工部局华董,名额由候补议员递补。显然,这个精英群体逐步吸收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精髓,在鼓浪屿社区近代化建设和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①

在文化教育事业和推动社会文明建设方面,这个社会群体同样表现出他们的实力和智慧。他们不但创办了普育小学、闽南职业中学和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后改名慈勤女子中学)等一批新式学校,而且在资金、师资等方面大力支持新式教育,并积极参与学校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式教育的在地化。而在推进社会文明建设方面,许春草、张圣才等人于 1929 年倡导成立的,以“挽救遭受虐待迫害的婢女,伸张正义,反对封建的奴婢制度”为宗旨的“中国婢女救援团”堪称典范。在各界有识之士以及工部局的支持下,该组织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活动,先后收容挽救了 300 余名遭受苦难的婢女,受到国际联盟考察团的赞赏。是为厦门地区妇女解放运动史上鲜亮的一页。^②

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外多元文化的并存与交融已经渗透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教堂里唱诗班传出的悠扬歌声与种德宫、兴贤宫前喧天的锣鼓声鞭炮声并行不悖,各得其所;传统的戏曲、说书与西式的电影、戏剧共存,满足不同居民的偏好;西式的饮食习惯、时尚服饰成为了一批华人的喜好,但中式传统饮食习惯和服饰依旧流行;西医被越来越多的华人所接受,但中医依然占有一席之地;西洋音乐、体育等西式娱乐休闲活动日渐普及,但注重传统文化风情与底蕴的吟诗作赋、相互唱和,依旧大行其道。

固然,在当时中国社会大背景下,鼓浪屿并非世外桃源,也并非人间乐土。这里同样有贫困、有欺压、有凌辱,同样有嫖娼、吸毒、赌博和帮派械斗等不良社会风气,更有半殖民地制度下的种种屈辱。但是,这里毕竟是时代条件制约下一处多元文化交融产生现代性成果的地方,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遗憾的是,由于中日战争爆发,1938 年日本将侵略魔爪伸向厦门地区。尤其是 1941 年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完全控制了鼓浪屿,将鼓浪屿推入苦难

① 详见本书第六章。

② 详见本书第四章。

深渊。外国侨民纷纷撤离，华人，尤其是返乡闽南移民也相继离开，鼓浪屿不再是一处宜人的国际化社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国民政府收回鼓浪屿公共租界。但由于此后国内战争爆发，局势动荡，鼓浪屿也基本上停止了发展的脚步。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鼓浪屿才翻开崭新的一页。

综上所述，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近百年间，鼓浪屿这座远处中华帝国边陲海疆的小岛，从经由闽南移民世代辛劳开发，散发着浓郁的闽南乡土气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体验过东西方大交通律动的一处乡村，逐渐转变成由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官员及其亲属所组成的多国侨民所青睐的一处居留地，成了本地华人居民与外国侨民公共居住的社区，成了多国侨民展现和传播异域文化的处所。进而在以国内闽南移民为主体的本地华人居民、以返乡海外闽南籍移民为主体的华人精英群体，以及以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侨民的共同作用下，演化成一处带有浓郁的多元文化气息，传统与现代并存，中式与西式融合，初显现代市政风貌，管理井然有序，居住环境宜人的国际社区。

正是这样奇特的经历，使鼓浪屿在全球化进程提速，东西方交通全面展开，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交流的新时代里被推上时代的潮头，被形塑成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窗口和样本；使鼓浪屿在中华帝国沉重的大门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轰开，古老的文明帝国在一波又一波西学浪潮冲击下，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步履蹒跚地迈向近代化的特殊历史阶段，成了一群以闽南籍返乡移民和新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精英，自觉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精华，融合多国文化精髓，建构一处近代化城市社区的理想场所。

正是这样丰满的经历，使鼓浪屿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内涵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留下许许多多值得深入探究的历史启示。

作为一处五星级景区，当今天来自五洲四海、四面八方的游客踏上鼓浪屿，惊喜地观赏着岛上那一座座外形迷人，风格多样的建筑时，当他们感受着岛上丰富多彩的文化气息，体味着其中富含的历史内涵时，当他们的耳畔回响着一个个精彩纷呈，扑朔迷离的鼓浪屿传说与故事时，或许他们的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一连串的问题：是什么力量形塑了鼓浪屿的今天？在鼓浪屿穿过时代变幻无常的风云前行的路上，它曾经有过什么样鲜为人知的遭遇？为什么这样的经历会塑造出如此多姿多彩的鼓浪屿？鼓浪屿昨天走过的历史进程，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这些也正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节 检讨:研究回溯与资料检索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鼓浪屿只是一座无人居住、孤悬海上的小岛。大约在元代(1271—1368),邻近的闽南地区居民开始移居这座海岛。我们见到记载鼓浪屿最早的史籍,是刊行于明弘治庚戌(1490年)由镇守太监陈道监修,黄仲昭编纂的首部福建省志《八闽通志》。该志书始修于明成化乙巳(1485年),成于弘治己酉(1489年)。编纂人黄仲昭(1435—1508),名潜,以字行,学者称未轩先生,福建莆田县人,是明代著名方志学家、诗文家。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因上《谏元宵赋烟火诗疏》讽刺朝廷耽于逸乐,粉饰太平,得罪皇上,被廷杖、贬职,出任湖南湘潭知县,途中,改任南京大理评事。弘治元年(1488年),任江西提学僉事,然辞官回乡,历尽数载艰辛,编成《八闽通志》八十七卷。黄仲昭在序言中称:“其间若地理、食货、秩官、学校、选举、坛庙、恤政、宫室、丘墓、古迹之类,皆因诸郡所采事迹,随其详略,稍加删次。”^①透露出其编写通志的资料来源。据该书所载:“古浪屿在嘉禾里二十四都,居民二千余家,洪武间尝徙其居民,成化六年仍复其旧。”^②可见其时鼓浪屿称古浪屿。在明初,岛上居民曾经历内徙、复旧。但所载“居民二千余家”,恐不足采信。^③事实上,关于古代鼓浪屿的史料甚少。除了方志史籍等地方文献和家谱族谱等民间文献只言片语的记载外,我们仅能从考古发掘和岛上现存的民居、祠堂、庙宇以及墓地遗址等获得一些零碎的信息。由此可以粗线条地描述出古代鼓浪屿岛上来自闽南地区移民及其后裔生息繁衍的大致情况。

19世纪40年代以降,由于鸦片战争中英军一度占领鼓浪屿长达3年多,尤其是随着1843年厦门的开埠,外国侨民相继入住鼓浪屿,鼓浪屿受到的关注骤然增多,有关鼓浪屿的史料也便迅速增多,尤其是西文资料。这些

①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上册,八闽通志序,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上册,卷之一,地理,山川,泉州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③ 详细考证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史料包括外国侨民中的部分商人、传教士和官员及其眷属的私人书信、日记、旅行笔记和回忆录等等私家文献资料,也包括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新闻及其他相关信息,还包括官员、传教士为上司或相关机构撰写的报告、公函等官方或半官方文献或档案资料。^①更值得一提的是英美日等驻厦领事按照规定,每年定期向主管机关递交的有关所在口岸的领事报告,内容广泛,连续性强。与此类似的是海关报告。由于19世纪60年代初,厦门海关建立了由外籍税务司掌管的洋关制度,外籍税务司依照总税务司的指令,编制贸易年报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十年报告,提供了不少与近代鼓浪屿相关的史料。^②此外,类似的资料还有英国国会档案。不过,上述文献资料大多都是以有关厦门的信息为主的,与鼓浪屿相关的信息,只是作为附属部分,所占的分量很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与鼓浪屿的前近代史不同,早在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来的东西方交通急剧扩展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时期,厦门就深深卷入其中。是故,西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对厦门有了较多了解,因而在结束鸦片战争的谈判中选择厦门作为首批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之一。外国人自然首先将目光投向厦门本岛上的通商口岸。

与此同时,最初的鼓浪屿研究也就此缓缓展开。不过,和上述资料显示的情况一样,关于鼓浪屿的带有一定研究性质的文献,大多也是被包裹在有关厦门的研究或叙事中的,甚至有的只是出现在有关早期中外关系或中国历史著作的碎片中。前者如1872年英国人乔治·休士(George Hughes)在香港出版的《厦门及周边地区》(*Amoy and the surrounding districts*)一书、1996年英国人朱利恩·休斯·爱德华发表在《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上的《厦门地理通述》(*Amoy: General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③后者则如米琪(Alexander Michie)的《阿礼国传》(*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① 相关的材料可以参见 Willian N. Brown(潘维廉)编写的《老外看老鼓浪屿》(中英对照),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② 相关资料的中文译本,参见戴一峰等译编:《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年。

③ 译文见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4页。

Alcock)两卷本。^①

《厦门及周边地区》一书的内容包括厦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和通商贸易等。这是我们至今见到的关于厦门地区历史专题的最早的西文书籍。但其中仅有寥寥数语涉及鼓浪屿,简要叙述外国侨民在鼓浪屿居住的环境。在篇幅长达百余页的这本书中,有关鼓浪屿部分不足一页。《厦门地理通述》和《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商埠志》中的“厦门”一文中有关鼓浪屿的部分均有所增加,但依然只是作为厦门的附属内容。

我们至今见到的第一部有关鼓浪屿的专著,是英国人赫伯特·艾伦·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编写,1878年出版的《鼓浪屿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Koolansu*)。翟理斯1867年来华,曾先后担任英国驻汕头、厦门、宁波和上海等地领事。在中国生活了24年,是个中国通。期间于1878年出任英国驻厦代理领事,1881年离任。《鼓浪屿简史》内容丰富,对鼓浪屿的历史、地理、气候、人口、治安、土地制度、宗教、墓地、贸易、航运、外国侨民、休闲娱乐、风水、碑铭等等诸多方面均有涉及。但全书更多的是简介性的叙事,缺少学理性的阐述。与其说是一部学术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地方志书。或许正是因此缘故,据载,这部书颇受外国侨民的喜爱。有外国侨民甚至将其视为旅游指南类的工具书,作为圣诞礼物赠送他人。^②

有趣的是,这些文献的作者大多是通晓中文的外国在华官员和传教士,如翟理斯是驻华领事,乔治·休士于1862年12月至1865年4月和1869年12月至1875年3月两度在厦门洋关担任外籍税务司。实际上,早期的欧美汉学家大多就是从这类人中产生的。翟理斯回国后就曾担任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成为著名的汉学家。

进入20世纪,随着鼓浪屿辟为公共租界,随着从海外返乡的闽南籍海外移民纷纷入住鼓浪屿,随着鼓浪屿人口的急剧增长,随着鼓浪屿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的加速,鼓浪屿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有关鼓浪屿的信息资料随之不断增加。首先,随着地方报刊的增多,有关鼓浪屿的新闻报道、时政评议,以及各种社会生活动态的信息资料不断增多;其

①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 Willian Blackwood and Sons,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0.

② [英]翟理斯:《鼓浪屿简史》,载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5~166页。

次,随着鼓浪屿社会政治的急速变化,有关中外官方的交涉以及外国在华势力间博弈的信息资料不断增多;再次,随着鼓浪屿社区公共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演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互动的信息资料不断增加;第四,随着鼓浪屿新型休闲娱乐文化生活的传播、扩展,相关的官私文献资料信息也在不断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在成系统的系列性档案资料中,除了前面提及的领事报告和海关报告外,鼓浪屿工部局的档案资料提供了一个新的系列。这一系列档案资料不仅包括鼓浪屿工部局的年度报告、会议记录,包括工部局颁布的各种律令、法规和通告,还包括工部局与外部各种组织机构来往函件,以及工部局颁发的各种证件、单据等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生增量来自日本各种在华组织机构的调查报告。由于自甲午战争日本割占台湾后,日本将福建视为其势力范围,大举展开各种活动,其中包括开展各种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由此形成了诸如厦门三五公司编的《福建事情实查报告》^①、东亚同文会编印的《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②外务省通商局编印的《福建事情》、^③兴亚资料经济编第十二号《福建省事情》^④和台湾总督府热带产业调查会编印的《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⑤等等一系列文献资料。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类似城市指南的小册子出版,提供了一些当时的各种信息资料。如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等编的《厦门指南》、^⑥吴雅纯辑的《厦门大观》^⑦。民国福建省政府也陆续印行出版了一批全省的相关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资料。如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的《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⑧和《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合订本)^⑨等。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外,近代来华外国人所绘制的地图或所拍摄的照片,

① 厦门三五公司编:《福建事情实查报告》,台湾日日新报社印,1908年。

② 东亚同文会编:《支那省别全志》第十四卷,福建省,1918年。

③ 外务省通商局编:《福建事情》,1921年。

④ 兴亚资料经济编第十二号《福建省事情》,1939年。

⑤ 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編:《南支那の資源と經濟》,1936年。

⑥ 苏警予、陈佩真、谢云声等编:《厦门指南》,厦门:厦门新民书社,1931年。

⑦ 吴雅纯辑:《厦门大观》,厦门:厦门新绿书店,1947年。

⑧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历年对外贸易统计》,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发行,1935年。

⑨ 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福建省统计年鉴:第一回》(合订本),1937年。